

茶座

总第二十四辑 2011 第二辑

主编 王兆成 执行主编 王学典

历史学家茶座

山东人民出版社

郭世佑：谁是武昌起义的主要筹划者

李竞恒：衣冠的背影

孟祥才：我所知道的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

邹逸麟：步行“串联”白记（四）

吴 思：发现历史 重建信仰

刘一皋：揭疮疤与社会信任

聂作平：大汉朝的国有化运动

蒋建平：话说唐朝围棋





TEAHOUSE FOR HISTORIANS XXIV | 历史学家茶座24

主 编:王兆成

执行主编:王学典

学术助理:扬 眉

编委会:

于 沛 王 和 王子今 王春瑜 王曾瑜 邓小南
牛大勇 仲伟民 刘志琴 刘 平 朱政惠 苏双碧
李伯重 李振宏 陈春声 张国刚 杨念群 杨 豫
辛德勇 张耀铭 宋德金 赵世瑜 徐思彦 徐秀丽
徐庆全 黄朴民 阎步克 彭 卫 葛兆光 葛剑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学家茶座.第 24 辑/王兆成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6

ISBN 978-7-209-05807-0

I.历... II.王... III.史学—丛刊 IV.K1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2615 号

出 版 人 金明善

责任编辑 王海涛

封面设计 李海峰

版式制作 刘冉冉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sd-book.com.cn>

社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编辑部电话 0531-82098014

购书电话 0531-82098021

邮局邮发代号 24-50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16 开本(172×232 毫米) 10 印张 160 千字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4.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单位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目录

卷首语

003 王学典 记录历史比研究历史更重要

重读民国史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007 郭世佑 谁是武昌起义的主要筹划者

022 陆其国 辛亥年前孙中山在美国

027 李竞恒 衣冠的背影

035 张振文 许述 蒋介石与辛亥革命

历史现场

042 邹逸麟 步行“串联”日记(四)

049 王守中 《来自世界四方的日记》解读(六)——德国开拓殖民地及列强在中国的争夺

史论沙龙

059 刘一皋 揭疮疤与社会信任

070 刘军 从多数人暴政的视角看美国黑人的自由之路

学坛述往

076 孟祥才 我所知道的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

085 刘泽华 太晚的致意——由我的三篇文章说黎澍

旧案重审

092 聂作平 大汉朝的国有化运动

110 李 硕 李彪悲剧与魏孝文帝改革时代

人物春秋

120 姜 鸣 本来钟鼎若浮云——宝廷娶江山船女之谜

127 刘元树 包拯与包拯精神

史家自述

134 吴 思 口述 郑 雄 整理 发现历史 重建信仰

掌故钩沉

147 散 木 一段李鸿章的逸闻

151 蒋建平 话说唐朝围棋



TEAHOUSE FOR HISTORIANS XXIV | 历史学家茶座24

主 编:王兆成

执行主编:王学典

学术助理:扬 眉

编委会:

于 沛 王 和 王子今 王春瑜 王曾瑜 邓小南
牛大勇 仲伟民 刘志琴 刘 平 朱政惠 苏双碧
李伯重 李振宏 陈春声 张国刚 杨念群 杨 豫
辛德勇 张耀铭 宋德金 赵世瑜 徐思彦 徐秀丽
徐庆全 黄朴民 阎步克 彭 卫 葛兆光 葛剑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学家茶座.第 24 辑/王兆成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6

ISBN 978-7-209-05807-0

I .历... II .王... III .史学—丛刊 IV .K1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2615 号

出 版 人 金明善

责任编辑 王海涛

封面设计 李海峰

版式制作 刘冉冉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sd-book.com.cn>

社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编辑部电话 0531-82098014

购书电话 0531-82098021

邮局邮发代号 24-50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16 开本(172×232 毫米) 10 印张 160 千字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4.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单位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记录历史比研究历史更重要

王学典

本“茶座”自开张以来,刊发了大量日记、回忆、检讨、访谈等等。编者们在刊发这些作品时,绝不想追风猎奇,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理念,那就是认为“记录历史比研究历史更重要”!

“历史”这一概念实际上由两部分内容构成:一是指对历史的记录,一是指对历史的解喻亦即研究。前者对后者的相对重要性在于:你不解喻后人可以解喻,你不考订后人可以考订,而你不记录后人则没办法再记录,某一层面的历史就有可能因无相关文献支撑而永远湮灭,——“拿证据来”,是历史学的基本法则!所以,记录历史是前提,而研究历史则可早可迟!

不特此也!这里所说的“记录”不仅是指官方的档案,——这对历史研究来说当然极端重要,更多的是指来自某些特定历史个体的回忆。——这些历史个体因有幸见证了某一重大历史事件、某一重大历史时刻、某一重大历史进程,从而有可能使自己的相关回忆变成基本的历史文献,如本“茶座”第一辑所刊登的刘吉纯先生的《难忘的“九一三”前夜——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一文,即属此类。这一类的回忆将具有发覆历史真相的意义,使刻意被沉埋的事实现出原形。

发覆真相、拾遗补阙、提供细节、引入现场,相对于某些重大事件,某些见证人的记录所具有的功能毫无疑问是多方面的。但事实上,来自草民百姓对时代巨变和历史苦难的感受和体验则最具历史的价值,这些观察和感受因源于生活的最深处而具有为时代集体作证的特殊价值。其中,对“大饥荒”和“文革”的回忆已具抢救记忆的性质,“改革开放”也因已过去30年,目前也具有了回忆的必要性……

“记录历史比研究历史更重要”,这对当代史、当下史而言,其意义不言而喻!如果再考虑到官方与民间、主流与边缘等不同记录主体之间的取舍差异,有条件的普通人拿起笔来记录历史的重要性就更加不容忽视了!

目录

卷首语

- 003 王学典 记录历史比研究历史更重要

重读民国史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 007 郭世佑 谁是武昌起义的主要筹划者
022 陆其国 辛亥年前孙中山在美国
027 李竞恒 衣冠的背影
035 张振文 许述 蒋介石与辛亥革命

历史现场

- 042 邹逸麟 步行“串联”日记(四)
049 王守中 《来自世界四方的日记》解读(六)——德国开拓殖民地及列强在中国的争夺

史论沙龙

- 059 刘一皋 揭疮疤与社会信任
070 刘军 从多数人暴政的视角看美国黑人的自由之路

学坛述往

- 076 孟祥才 我所知道的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

085 刘泽华 太晚的致意——由我的三篇文章说黎澍

旧案重审

092 聂作平 大汉朝的国有化运动

110 李 硕 李彪悲剧与魏孝文帝改革时代

人物春秋

120 姜 鸣 本来钟鼎若浮云——宝廷娶江山船女之谜

127 刘元树 包拯与包拯精神

史家自述

134 吴 思 口述 郑 雄 整理 发现历史 重建信仰

掌故钩沉

147 散 木 一段李鸿章的逸闻

151 蒋建平 话说唐朝围棋



谁是武昌起义的主要筹划者

郭世佑

编者按：该文为本社即将于本年8月出版的郭世佑先生所著之《教科书外说辛亥》一书中的一篇。

历史的因素总是多项和相互联系的，也是复杂的；单个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往往是相对的。研究历史人物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知人论世、窥一斑而见全豹，而不是像八百里水泊梁山排座次那样，一定要给某些人物的功绩大小排出序列，非得争一个谁最重要谁为其次、谁是第一第二不可，这样的做法只能满足于时下中学应试教育的“定论”思维，把历史人物绝对化和脸谱化；仅为考试的记忆标识而存在，却不为解读历史的复杂性与真实性而存在。唯有把个体研究同群体研究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克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而不至于不声不响地站在个别历史人物后人的情感立场与利益立场，拼命为某个人物争功，不厌其烦地做辩护律师，却找别人的茬，搞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既不大气，也不客观。如果历史研究者终生只满足于研究某个历史人物或者某类历史人物，一般就难以跳出这样的情感纠葛。不过，当某些重要人物的显赫事功与生命价值已被集体无意识地忽略甚至遗忘时，清理这类人物的历史功绩就是求真的本职所在，而非可有可无的了。

首先应该指出，近代反清革命运动之所以被叫做“辛亥革命”，那是因为清末的辛亥年（1911）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而不是别的。许多辛亥先驱还常把武昌起义称作“武昌首义”，中华民国的国庆纪念日还以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之日为依据而确定，那也是因为武昌起义的特殊位置与贡献所致，这一点毋庸置疑。正是武昌起义给了清朝统治以致命的打击，引发了全国反清革命运

动高潮的到来,武昌起义就是埋葬清朝统治的总动员令。在此之前,并非没有武装反清的起义举动。远的不说,就在辛亥这一年,比武昌起义还早半年,由孙中山、黄兴直接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就在4月27日发生过,那是孙、黄投入精力最充分、筹款最多的一次暴动,牺牲了不少革命精英。只因武昌起义不是同盟会总理孙中山直接领导的,而是在所谓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引爆,在一个同反清革命毫无关系的清朝新军协统黎元洪的统率下成功的,除了孙中山说对它感到意外,还有很多人也这么认为,直到今天,有些新出版的论著还把它说成“偶然”成功。所以长期以来,无论是把武昌起义叫做“总理第十四次起义”的国民党史家,还是1949年以后的一代史学研究者,人们除了对被誉为“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湖北新军工程营代表熊秉坤谈论得较多以外,对发动和组织湖北新军革命士兵的有关领导者的研究都不够重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彪炳史册的辛亥革命主要是以清末辛亥年一举成功的武昌起义命名的。如果离开了这场起义,辛亥革命的历史恐怕就得重写了。

迄今为止,大学历史系的近代史专业教材对兴中会、同盟会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讲了不少,对武汉地区革命党人的组织发动却语焉不详,中学历史教材更是如此。以使用普遍的岳麓版、人教版、人民版、大象版四种高中历史教材为例,这四个版本均未提到文学社的负责人蒋翊武、刘复基的名字,更不用说介绍文学社了。岳麓版教材必修本只提到接替蒋翊武的起义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和协统黎元洪。大象版教材(2004年6月第1版)介绍武昌起义第一枪,也只提到“1911年10月10日晚,驻守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士兵程正瀛开枪打死一反动军官,熊秉坤随即赶来,鸣笛聚众,宣布起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历史教材(2008年7月第3版)更是丝毫不提文学社、共进会及相关人物。

许多武昌起义的当事人经常提到“首义三武”,即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共进会实际负责人孙武和共进会骨干张振武;至于各自的具体建树如何,“三武”是否三分秋色,都缺乏系统的诠释。1980年左右,笔者在长沙岳麓山下求学时,仰望那一群湘籍辛亥英烈的墓碑,有感于文学社社长、武昌起义总指挥蒋翊武的革命事迹未见彰显,在近代史大家林增平教授的鼓励与指点下,对蒋氏的革命事功作过专题思考和表述。文章发表不久,就觉得自己的立论还需要斟酌,不能

根据领导者的职务来确定历史地位与功绩。

民国时期的军事理论家蒋方震(百里)在《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中指出:“历次革命皆自外铄,其势不坚,而武昌革命则其势由内而外,由下而上,其成功也,非偶然也。”武昌起义之所以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一举成功,主要是因为武昌革命志士组织周密,筹备细致,不像华南地区的武装暴动那样,经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来得快败得也快。就如此重要的一次武装起义来说,究竟谁才是筹划武昌起义的关键人物,确实是值得关注的学术问题,需要静下心来,凭资料说话。准确的答案既不是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也不是湖北共进会的实际负责人孙武,而是起义之前就被杀害的文学社评议部长刘复基——一位胆识俱全的革命主将。

一、丰富的早年阅历

刘复基,字尧激,亦作尧澄、瑶臣,化名汝夔,1885年1月出生在湖南武陵县柳叶湖,就是现在的常德市武陵区白合山乡柳叶湖村。本属农民家庭,父亲文福在常德府城大河街经营灯笼铺,刘复基从小就随居府城,与兄长星激同时到私塾教师家里接受启蒙教育。

常德属于广义的湘西地区,东北多湖,西面多山,哥老会的反清活动比较频繁,复基从小耳濡目染,参与其中的联络。他的年龄不大,谈不上资历,只因胆识过人,就被举为头目,叫“金凤山刑堂”。1901年,复基在常德结识了比自己大两岁多的桃源革命青年宋教仁,邀到家里,订为莫逆之交。从此,求学于武昌文华书院的宋教仁每次上学与回家经过常德,都一定要同复基会面,畅叙一切。

1903年,复基考入设在德山的武陵县立高等小学堂,经常演说清朝腐败,满、汉势不两立的道理,连该校校长都觉得他说得有理,不再阻挠。第二年,才华横溢的宋教仁以华兴会副会长的身份潜回常德,密谋响应长沙起义。复基就以常德鸡鸭巷饭馆厨师的名义,联络会党和新式学堂的进步青年。当时,澧州青年蒋翊武就在常德的湖南西路师范学堂读书,也成了复基发动的对象。宋教仁的日记还记得很清楚,农历九月二十三日那天辰时从桃园坐船,中午抵达澧市,下午到常德城区五省栈,与刘复基、胡范庵见面,准备第二天赶往长沙,刘、胡都想

跟宋一起到长沙去参加华兴会起义,宋只同意胡与晏某去,委托刘复基留下,让他与另一骨干楚义生“在常经营一切”(《宋教仁集》)。

当宋教仁坐船三日赶到长沙时,华兴会的起义计划已经事泄,黄兴与宋教仁等遭到通缉。这天还有两个党人被杀,其中一个在临刑前就供出了常德有个“宋家仁”。宋教仁从武昌顺江东下,从上海亡命日本,刘复基陷匿老家柳叶湖,暂避风声。这时,湖南会党头目马福益潜赴湘西洪江,重谋起义,刘复基设法与马取得联系,重新组织会党。

1905年春,马福益在湘乡被捕遇害,刘复基潜赴省城,试图再作发动。而湖南当局戒备甚严,收效不大,复基及时函告宋教仁,“述自去冬以来屡次失败之状,慷慨悲愤,令人泣下”(《宋教仁集》)。刘复基收到宋教仁的回复,得知同盟会已在东京成立,精神为之振奋。他凑集盘费,邀兄长星瀚于10月启程东渡日本。从现存的同盟会会员名册中可以查到,11月21日,复基由宋教仁主盟,加入同盟会。很多回忆与论著都断定文学社的社员都没有出过洋,都是土生土长,黄兴的女婿、美籍知名学者薛君度教授在《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中也说,文学社骨干们“从没有出过国门”,这便忽略了刘复基的特殊身份,显得有点以偏概全。

复基在日本的盘费告罄,停留的时间不长,就趁着留日学生抗议日本政府颁发中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的回国浪潮,携带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六百份离日,在沪、鄂、湘等地散发,重新联络同志。

在上海,他配合湘籍同盟会骨干姚宏业等,以中国公学为重心,发展同盟会会员,该校学生蒋翊武就是他介绍加入的。他还与另一湘籍同盟会骨干杨卓林成立同盟会在上海的外围组织“竞业学会”,办有《竞业旬报》,“专业提倡民族主义为宗旨”(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

在武汉,他与刘敬庵、张难先等取得联系,加入日知会,开始涉足湖北革命团体,为他后来再度赴鄂发动建立了人脉基础。

在长沙,他与覃振、胡有华等于府署后之五堆子设立报刊代派所,暗中销售《民报》,往返湘鄂之间,联络同志,宣传革命宗旨。他还通过在东京的宋教仁,向《民报》编辑部推荐内地同志撰写的革命稿件(《宋教仁集》)。1906年夏,他并协助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禹之谟,发起在岳麓山公葬陈天华和姚宏业的活动,

借以鼓舞民心,传播反清革命思想。经过刘复基和禹之谟等人的努力,华兴会起义失败后的湖南重现革命生机。复基给宋教仁的信中就说:“湖南局势甚好,必有呼汉族万岁之一日。”(《宋教仁集》)

革命充满冒险,挫折考验意志。由于萍浏醴起义失败,复基的战友禹之谟、覃振、刘敬庵、杨卓林等分别在湘、鄂、沪被捕,许多秘密活动机关同时遭到破坏,复基一时无法立足。适逢父亲病故,他以守制为名,回乡隐居。虽然如此,他“亦不以居丧废射猎,猎或数日不返,识者知其志别有所在”(熊十力《烈士刘尧激传》)。覃振从长沙改押故乡桃源时,复基还邀请蒋翊武等人,借狱中探监之便,继续商讨革命对策,矢志不渝。

可见,刘复基早年革命阅历的重要性已在蒋翊武之上。

二、文学社的实际负责人

1909年秋,已在汉口落脚的刘星澂向负责《商务报》的湘籍革命党人何海鸣推荐自家老弟,何很高兴,就请星澂把刘复基招来,协助办报,复基就邀蒋翊武同行。这时,湖北新军中有个革命团体,叫群治学社,它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一脉相承,虽几经挫折,一直坚持下来,难能可贵。复基抵达汉口时,群治学社社员大都已随军赴防襄河一带。他和翊武很想参加,就邀《商务报》报馆的鄂籍革命青年詹大悲,以记者(“访员”)名义潜赴天门,与群治学社社员蔡大辅取得联系。翊武随即化名入伍,复基则持蔡大辅所书的介绍信返回武汉,与该社负责人李六如接洽,加入群治学社。李六如,又名抱良,湖南平江人,与刘复基一谈就很合拍,对他评价很高。李六如后来撰写的回忆录《文学社与武昌起义纪略》与自传体小说《六十年的变迁》对刘复基都有极高的评价。小说中的“季交恕”,就指李六如本人,他不过是在自己姓名的每个字上加了笔画而已。

同年12月,《商务报》的老板病故,该报改组,社址迁到汉口英租界致祥里,詹大悲为主笔,复基任会计兼发行,何海鸣任编辑,言论日渐放开。他们就想把《商务报》办成群治学社的机关报,以便壮大学社的力量。据熊十力回忆,某个雪夜,刘复基穿着布袍,邀何海鸣登蛇山,不是赏雪,而是鸟瞰武汉三镇的地形,商

谈革命机要，刘复基的鞋子都结冰了，也不觉得寒冷。（《烈士刘尧激传》）

当时，南方的保路运动出现高潮，清政府坚持举借外债，转移路权，湘籍君主立宪论之干将首领杨度附和甚力。1910年春，刘复基与李六如听说杨度路过汉口，就借湖南会馆之地，召集湖南旅鄂绅学各界人士，名义上欢迎“乡贤”，实则计划惩办他。有一天，刘复基与李六如等赶到汉口英租界附近的既济水电公司，邀请杨度赴会，杨见势不妙，一再谢绝前往，刘复基就扯住其辫，把他拽出大门。英巡捕出门干涉，刘复基、李六如等数人都被抓到巡捕房，“外闻尧激吆喝殴打声不绝”（同上），《商务报》因此而停刊。

此后不久，长沙发生抢米风潮，湖广总督拟调兵入湘协助镇压。复基与查光佛等人商议，联合三十二标的群治学社社员黄申芎等一同起义，托孙昌复从汉口潜运炸弹到武昌，拟由四十一标发动。这是湖北革命党人制定的第一个明确的武装起义计划。由于事泄，黄申芎等人逃走，起义无法发动起来，刘复基化名汝夔，从汉口某理发店购得一条假辫，投入四十一标当兵。李六如后来回忆说，因复基“有才智，自他人入伍当兵后，军队中的革命运动更加发展”。

1910年9月，群治学社改名为振武学社，以原群治学社发起人杨王鹏为社长，李六如为庶务，复基等人襄助其间。不久，杨王鹏的活动被队官施化龙侦知。李六如因被查出曾参与殴打杨度，也遭重责开除。杨、李二人离鄂前，在社务交接问题上，经过了一番仔细考虑。鉴于振武学社的活动和殴打杨度事件已引起官府的警惕，他们就没有把社务直接交给新军中革命阅历最丰富，而且“智勇足备”的刘复基，而是交给遇事比较谨慎，也具备一定的革命阅历和经验，又很尊重刘复基的另一振武学社骨干蒋翊武。照李六如的话说，是“因蒋翊武很像一位乡下佬，经常笑嘻嘻的，会团结人，而且进营以后，还没有露过头角”（《六十年的变迁》第1卷）。两位湘籍同乡的这个选择，对确定蒋翊武在即将改名的文学社中的领导职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11年1月30日，蒋翊武和刘复基邀集部分振武学社骨干，在武昌奥略楼（无论是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还是后人的著述，多称黄鹤楼或风度楼，或黄鹤楼之风度楼，均不确切）召开文学社的成立大会，公举蒋翊武为社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文学社骨干章裕昆说：文学社的“实际工作多是刘尧激负责”。在何海鸣